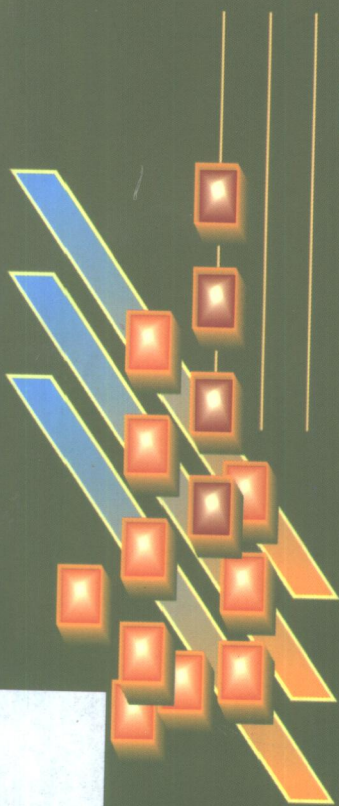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博士论丛

制度变迁与 中国农民经济行为

郑风田 著

中国农业科技
出版社



F321
2576

298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

郑风田 著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郑风田著. -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9.12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博士论丛)

ISBN 7-80119-652-X

I. 制… II. 郑… III. 经济制度-关系-农民-经济行为-研究-中国 IV.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1624 号

责任编辑

技术设计

出版发行

经 销

印 刷

开 本

印 数

版 次

定 价

薛 尧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 68919711; 传真: 68919698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北京奥隆印刷厂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6.5

1 ~ 800 册 字数: 16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18.00 元

前 言

本书主要从制度层面上对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作一全面深入的研究。由于农民的经济行为包括农民投资、消费、市场行为等内容，范围十分宽泛，为研究方便，本书仅局限于农民供给行为的研究。整个研究结果共分上下二篇6章阐述，主要内容如下：

上篇主要从理论上探讨农民的理性问题及制度变迁与农民供给行为的关系。

下篇为实证分析部分，即对1949~1990年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的中国农民的供给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第4、5章以两个对农民供给影响比较大的制度：购销制度和农地制度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农民在不同制度下供给行为的变化规律。第6章采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估算不同制度变化对农民供给变化作用的大小。

上篇包括三章：主要研究农民的理性问题及农民供给反应的微观基础。

第1章为制度理性假说，它是全文的立论点。在详细分析和评述几个有关农民经济行为假说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有关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假说：制度理性假说。该假说主要从制度方面来揭示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它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合理与否主要受制于制度。适宜制度导致农民的理性供给行为，制度悖论或不适宜制度则导致农民的非理性行为。理解农民的各种行为应该从制度层面上去分析。该假说进一步认为：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种种供给行为变化和制度变迁密切相关，适宜制度能促进农民供给的显著增长；不适宜制度则导致农民供给的停滞甚至显著下降。适宜制度一般产权结构明晰，交易费用低，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较好；而不适宜制度一般产权结

构模糊，交易费用高，激励机制低下，监督机制较差。本章的主要假说在以后的各章中将从不同角度得到有力的支持依据。

第2章和第3章主要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不同制度下农民供给行为的变化。

第2章主要讨论了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小农的供给反应。

由于自给自足的特殊性质，例如生产和消费的合一性、内部的封闭性、种植结构的单一性、机会成本的稀缺性、劳力的自雇性等，小农的供给行为也迥异于现代企业的供给行为。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特点为小农供给的内卷性，即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小农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投入劳动，以获得所需食品。这是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小农必然的理性反应，在此制度下，小农的内卷化生产是合理的、正常的。如果撇开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单论谈及农民内卷化生产是否为理性行为是不适宜的。在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小农的第二个供给反应特性是劳动——消费的均衡性，即小农的供给点介于产量正效用和劳动负效用之间的均衡点。劳动数量的投入和产量供给数量的大小皆围绕劳动——消费均衡点而变动。另外本章还对影响小农供给的一些变量因子变动对小农供给的影响作了简单的分析。作者还认为，虽然纯粹的自给自足经济制度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但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边远贫困山区的小农生活于近似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下。了解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小农的供给反应特点可以使我们摆脱动辄对这些小农冠之于落后、愚昧、无知帽子的习惯。自给自足下小农供给行为的矫正只能靠创造各种条件来促进制度创新。

在第3章，我们主要讨论了在由自给自足制度向商品制度变迁过程中，农民供给行为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在商品化过程中，农民供给的微观基础——农家经济发生了很大转变，由此而决定了农民的供给行为也迥异于自给自足经济。在半自给自足经济制

度下，农民的供给打破了单纯为自己供给的旧框框，转为向社会提供一批剩余产品，并且农民的供给在量上也扩大了许多。在半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农民首先为满足家庭生计而生产，然后提供商品供给，故农民的供给量中有一部分是不受价格干扰的，而另一部分供给量，即超过生计性供给量之外的生产能力则按利润最大化来生产。农民在半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的理性供给行为既不同于单纯为自家生计而生产的自然经济下的小农，也不同于完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完全商品经济下的农场主，它兼有二者的特征。制度的变迁是农民理性供给行为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另外，本章还探讨了现代生产要素、风险、人力资本积累、农家生育、农民家庭收入、农产品价格、农户商品化程度等变量对半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农民供给反应的影响。正确理解半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下农民的供给反应对我国异常重要，因为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形期，我国农民大部分还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下，如何使我国农民的供给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地发展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课题。完全商品经济制度下的农民很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农场主。有关农场主的供给行为在西方经济学中论述较多，本文不再加以讨论。本文把研究重点放于1949~1990年对我国农民供给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之上。

下篇为制度创新与中国农民供给行为的实证分析，包括3章。

第4章主要分析了计划、市场与农民供给反应的关系。在以计划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统购统销制下，由于激励机制缺乏，导致农民供给的低效率和停滞不前。而在“双轨制”下，农民的供给行为在不同的制度细微差别中变化多样，但大致符合双阶段调节变动规律。农民在“双轨体制下”，当出现不完全计划限制时，其供给容易大起大落，从而加剧粮食市场的波动。不同粮食产区以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农民在“双轨制”下其供给反应也有

许多差异。从“双轨制”下农民供给行为的多样性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制度变动和农民供给行为的密切关系，从而再次验证了我们在第1章中提出的有关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制度理性假说。另外，本章还对“双轨制”的弊端以及“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方式作了简单的评述。其结论为：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较为适宜，突变式的制度变迁由于实施成本高昂，大部分的风险转移到结构异常同构的小农头上，容易加剧市场的波动。最后，本章还对计划、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的稳定性作了简单的评述。在统购统销制下，农产品市场大部分受计划价格调节，不易发生大规模的价格变动，农产品市场相对较为平稳；在“双轨制”下，在“双阶段”突变调节的作用下，农民的供给反应容易发生突变，从而引起农产品市场的变动，但变动的幅度不是很大，农产品市场相对也较为平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2亿多异常同构的农户，其农产品供给在市场价格刺激下，极易大起大落，这个缺陷可以通过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粮食保护价、农产品种植多样化等政策制度加以弥补。

第5章主要探讨了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供给反应的关系。农地制度是农民供给反应的一个重要变量，不同的土地制度形式，农民供给反应相差很大。中国农地制度的四次大变迁，导致农民供给从供给迅速增长→农民供给平稳增长→农民供给停滞→农民供给的迅速增长→农民供给的平稳增长。农地制度和农民供给行为关系密切。本章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的农地制度存在的产权残缺对农民供给行为所造成的影响。现有的农地制度中所有权紊乱、土地流转性很差、土地均分、承包期过短等产权残缺导致农民对土地的长期预期不足，投资行为短期化，由此而造成稀缺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农民对土地的掠夺使用、土地抛荒弃耕等现象的发生。在本章的第三部分，笔者对目前学术界提出的三种土地制度改革模式分别进行了评述。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等由

于实施成本高、操作复杂等特点，不易作为未来我国农地制度的选择。对目前集体所有制的渐进变革应该是唯一的最佳选择。针对集体所有权容易造成多个“上级”以所有者的名义侵蚀农民的收益权，过多干涉农民的经营行为，还易造成农村土地经营的细碎化、均田化等缺点，笔者提出了新型的农地制度模式：即在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民永久使用权、加强国家宏观管理权三权分化基础上，实行农民永包制、单嗣继承制下的家庭农场制，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发育。另外，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还提出新的农地制度实施的条件：即大力培育城乡市场、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建立合理的土地租税制度等。

上篇和下篇的第4、5章主要从理论上详细分析了制度和农民供给反应的关系。但这些分析还仅限于理性的推理、归纳和描述，属定性分析范围。在第6章，我们借助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1978~1990年影响我国农民供给的主要经济制度与农民供给反应的关系作一定量测算，以期估算出不同制度选择对农民供给增减的作用。

第6章主要探讨了1978~1990年制度变迁对农民供给增长的贡献。

在1978~1984年，农民总供给增长为60.5%，测算结果表明这一产出增长中有40.5%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变迁。其中集市贸易的扩大和农业经营制度的转变两项制度变革最为重要，单此二项就贡献了1978~1984年产出增长的1/3（32.5%）。其中集市贸易在量上的扩大贡献了18.5%，农业经营制度由人民公社转向家庭经营贡献了14.4%。由于收购价格提高、结构转换、天气变化的贡献，分别占4.95%、1.65%、1.40%。各种要素投入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59.8%，其中以人力资本投入（贡献31.3%）和化肥投入（贡献24.86%）最为重要。土地、

资本、有机肥对总产出的贡献为 -1%、3.55%、1.02%。1985~1990 年农民总供给增长了 27.3%，其中 17.3% 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占 63.4%），10%（占 36.6%）源于制度变革导致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各种制度变革中，集市贸易量增长贡献占 29.3%，国家收购价格提高、市场价格的提高、粮食播面的增长和天气变化，分别对总产出贡献为：2.93%、3.29%、2.50%、3.66%。在各种要素投入中，化肥施用量的提高占了绝对的比重。它对总产出的贡献为 37.72%，土地、人力资本、流动资本、有机肥等对总产出的贡献分别为：2.9%、5.49%、11.72%、5.49%。

另外，本章结果表明：在目前中国农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时期，现代生产要素和制度变革都有重大作用。向农民投资非常重要。本章的测试结果显示，农作经营制度由集体化转向家庭经营对总产出的贡献在 1978~1984 仅占 14%，把此期间农民供给增长的原因统统归之于家庭经营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观点是不适当的。

本书主要从制度层面对我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找出我国农民经济行为变动的一般规律。从以上简单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农民的供给反应呈现复杂性、多样性、理性化的特点，只能从多角度、大视野出发才能正确把握这些特点。否则，必然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导 言

0.1 研究背景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是 60 年代以后的事情。从瑞典皇家学院近几年接连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于新制度学派著名学者科斯、诺思等，我们不难看出其巨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过程方面是一种极有力的工具，深得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青睐。

对制度创新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填补的空白很多。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的原因，有两个比较难以克服的困难：难以量化与经济变迁过程漫长。这两方面的原因阻碍了新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在解放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制度一直处于一个快速变动时期，并且各个制度的阶段变化分明，各种资料相对来说保持比较完整，这给研究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研究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变迁的原因，将不仅是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服务，而且对经济发展理论本身也是一个贡献。

我国近几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已开始重视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还仅局限于表观现象的描述，普遍缺乏理论深度的把握。我国目前已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如何实现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未来的市场制度如何建设等问题，只能在透彻了解我国农村市场主体——农民经济行为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研究制度和农民供给行为的关系是相当重要和富有挑战性质的。本书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其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

0.2 方法论概述

本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上把握农民的经济行为，正是基于此，本书的上篇大部分属于理论性质的研究，因此定性推理或者说逻辑上的抽象法是本篇主要采取的方法。在本书的下篇，则以实证分析为主，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力求从量上把握中国农民供给的特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历史和现象相统一，实证和规范分析相互补充是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

0.3 主线与体系结构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制度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关系的理论探索，研究的思路以经济发展的时序为线索，力求理论研究与历史发展相统一，逻辑分析与经济发展顺序相一致。显而易见，要做的第一步即为农民理性判断问题，在此基础上，遵循农民经济行为演化顺序，本研究重点分析了不同的演化阶段农民经济行为的微观特点，并对几个重要制度与农民行为的关系、农民供给增长和制度变迁作用的大小进行了估算。

本书共分2篇6章。上篇为制度理性假说与农民供给反应的微观基础，包括1~3章。第1章为农民供给行为与制度理性假说，第2章为自给自足制度与农民供给反应，第3章为半自给自足经济制度与农民供给反应。

下篇为制度创新与中国农民供给行为的实证分析。包括4~6章。第4章为计划、市场与农民供给反应,第5章为农地制度与农民供给反应,第6章为制度创新与农民供给反应的计量分析。

上篇 制度理性假说与农民供给 反应的微观基础

本篇共包括3章。第1章在总结有关农民经济行为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农民理性假说：制度理性假说，并以此作为本书的理论依据。本书也是在制度理性假说的基础上，以制度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为主线展开的。另外，按制度变迁的演化顺序，在第2和第3章，笔者详细地分析了不同制度下农民供给行为的特点与影响因素，为下篇的实证分析打基础。

1 农民供给行为与制度理性假说

现代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研究以“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为其最基本的前提。理性的定义为“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供他选择的方案时，会选一个能使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当然，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每个决策者新面临的外部条件的限制，例如资源、制度和技术不同而不同。理性行为是当今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并被广泛地引用，其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的诺贝尔获奖演说的题目就是“经济分析中的最大化原理”。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前提不仅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而且也适用于古代传统的以及非市场的经济。这并非说人类行为的表现不同的经济中没有不同，而是说人类的行为之所以表现不同，不是它的“理性”有所不同，而是制度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造成可供他们选择的方案不同所致。如果运用理性原则分析企业或公司的经济行为，大多数人可能无异议。但如果将理性原则用于解释农民特别是小农的经济行为，这种“庞大”的企图就可能招来众多的责难和不解。因为，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保守、传统、非理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诸如农民生育、婚姻、社区参与、短期投资等等，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能根据理性原则来获得解释的，有关农民的理性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作过很透彻的分析。下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他们的结论，然后针对我国农民的具体特点，提出有关中国农民经济行为

的理论假说：制度理性假说。

1.1 几种农民理性假说简评

1.1.1 舒西奥多·W·舒尔茨：理性农民

针对传统的农民为非理性的观点，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坚持把传统农业部门的农民看作是理性的，传统农业的农民如同在特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于价格反应的灵活，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总是有效率的，这就是所谓“贫穷而有效率”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只要增加农户识别及有效使用较好技术的知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人力培训），引进现代农业的高质量的投入，如良种和新技术，便可望打破传统的内部均衡和停滞条件，可望激发小农的投资和创新活动，从而带来更高产量。舒尔茨的“农民理性”学说严厉地批驳了以往广泛流行的观点，即把传统农村的农民看作是保守的、非理性的，并将农民的贫困也归咎于他们的保守、非理性和对价格反应的迟钝。一个经常用来证明传统农民的行为非理性的理由为：农民缺乏作为现代企业家所应具备的品质条件——储蓄。在半自然经济中，农民一般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由于他们的收入低，当然为生产储蓄的意愿更低。

为了效用的最大满足，一个理性的人本应该同时考虑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鉴于此，传统农民的低储蓄倾向，是由于农民不具有平衡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能力，还是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在 50 年代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主张前者。但舒尔茨根据他对危地马拉、印度及其他地区农民行为的观察发现，传统的农民之所以没有储蓄的习惯，是因为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传统的农民根据长期的生产经验，已经把他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做了最